

以及连续三代人的西北征蒙定疆平藏用兵，尤其差点颠覆清廷的白莲教起义之后，统治者和御用官僚机器已乐意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、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，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，尤其“承自乾隆、下启道光”的嘉庆帝寻找到绝佳的辩护理由——“法祖”，以严守祖训之名，僵化地照搬本朝先王治国方针，只要老祖宗们的东西，都原封不动如法炮制，而“如何是好”“没办法”“了不得”已成了从皇帝到文笔小吏的口头禅，大清帝国在无形中耗空了精华，沦为风中残烛。

作为嘉庆、道光两代帝王信赖的爱将，杨芳掂量着手里的筹码，身后的劲卒跟着自己打垮过飞鸟都无法进入的苗寨，抓住了比狐狸还狡猾的“逆首”张格尔，即便对付自称“上帝之鞭”的中亚浩罕骑兵也没失手过，确实，他有着“战神”的资本。可命运是无情的，1841年初冬，习惯銃炮齐鸣之后短兵相接的清军在广州城外一触即溃，身边戈什（满语意为“侍卫”）回报杨芳，兵勇连英军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便倒地了，“夷船”几百步外轰开营垒，几无可挡之物。惊慌失措的杨芳，竟糊涂到收集百姓所用的马桶，装满污物摆到前线，希冀能顶住洋人的坚船利炮，只落得“粪桶尚言施妙计，秽声传遍粤城中”的名声。

## “中世纪武装部落”

杨芳乃至道光一朝中国军队的悲剧是结构性的。英国鱼鹰出版社在名为《维多利亚女王之敌》一书中盘点了1837-1901年英军所交手

右图：

（左）鸦片战争时期，清朝驻防八旗军一个基层佐领的武备，随身弯刀、硬弓、装满箭矢的箭囊，这套装备与1644年清军入关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。

（右）1856年，以“亚罗船事件”为借口，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这是集结在香港的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步枪队士兵，他们准备越过深圳河，进攻广州。



过的各国武装，其中对清军的定义是“冷热兵器杂陈的中世纪武装部落”，论战斗力不仅逊于俄国、土耳其军队，连南亚次大陆的锡克族武士、南非的布尔民兵都“等而下之”。

就体制编制而言，道光朝的清军有八十万之众，主体是京师八旗、驻防八旗和绿营，前者旗兵乃世袭身份，生而食粮，传数代之后，大部分人已忘练武习操，和国家机器一样日渐腐败，后者维持社会治安乃至镇压一方起义尚算有效，但因军饷过少，且兵额多为虚数，检阅时则以雇佣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充数，武官由捐纳出身，军队缺额在半数以上，所以腐化已到极点，以致1840年战事一起便不堪一击。反观英国，经历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威灵顿勋爵的铁腕改革后，英军编制国家化、技术近代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，以鸦片战争为例，英国出动的“东方远征军”最高峰时只有1.5万人，主要兵源在印度解决，即大部分士兵系孟加拉、马德拉斯、迈索尔等地雇佣士兵，军官由英国人担任，训练装备全是欧洲正规军

那一套，具有良好的步炮骑协同能力，这还不算具有压倒性的海军力量。

武器方面，在最基本的火药上，清军的窘态都让后人汗颜。战争前后，清军仍按明代药方人工配制火药，抗英最坚决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奏疏中提及，“硝性主直（即射远作用）、磺性主横（即爆炸作用），炭粉主燥（即助燃作用……盖硝多力能致远，磺少不致炸裂”，大意是广东水师要准备两种配方的火药去对付敌人：其一是枪炮发射火药配方，硝80斤、硫和炭各10斤；其二是大小火箭所用的燃烧性火药配方，硝16两、硫1两、炭1.5两。由于这两种火药配方含硝量偏高，都在80%以上，所以在广东沿海贮存和使用容易吸湿转潮，因而难以点燃乃至失效。这给备战带来巨大麻烦，如果火药贮存过多，会因过时转潮而失效，贮存不足，便难以应付急需，只好“季季置办”，随造随用，随用随造。果然，战争来临后，无论力战至死的关天培，还是后援不力的杨芳，所用火药要么数量不够，要么潮湿失效，处处